

doi:10.16018/j.cnki.cn32-1499/c.202003015

# 布瓦洛古典主义文艺观的美学研究

柏红果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布瓦洛古典主义文艺观以人文主义及笛卡尔唯理主义为直接根基,上承贺拉斯,源起于《诗学》,得益于其自身讽刺天赋及艺术修养,繁荣于与宫廷王权政治文化利益的部分同调。《诗的艺术》为古典主义立法,述其原则、定其体裁、彰其品格,以灵感拱卫理性,体现了布瓦洛文艺观历久弥新的美学意蕴。其历史影响广及文学、政治及哲学各领域,在当代则以理智、稳定、系统的思维方式与基本态度为呈现。

**关键词:**布瓦洛;古典主义;《诗的艺术》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20)03-0073-06

十七世纪,应法国古典主义作家以健全的理性发出的合情合理的呼号,巴那斯山的立法者布瓦洛发表了他的法典,自此,“连文学都要听从他的命令”。《诗的艺术》以一千一百行亚历山大诗体连缀成篇,总结高乃依、莫里哀、拉封丹及拉辛等的创作经验,对文学的体裁及其特质予以明确界定,对作家创作的道德立场及写作范式提出严格要求,实现了古典主义美学的理论化。

布瓦洛古典主义的文艺观,源起于亚里士多德,滋养于贺拉斯及笛卡尔,萌发自王权扶植与监控下的社会土壤,影响广及众多文化艺术领域,既曾以理性实现对极端个人主义的拨乱反正,以民主倾向与中央王权联合反击封建割据,也曾因规制森严阻碍文学形式的自由突破。

自《诗的艺术》问世始,学术界对其所作援引、阐释及评述不可胜数。总体而言,国内研究视野向内集中于布瓦洛对文学体裁的界定、要求及其对创作实践的指导作用,向外则聚焦西方古典主义总体脉络的梳理及其与前人或后继者的对比研究。此外,对理性、自然、真实等具体美学范畴的探讨也在布瓦洛文艺观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与其他文学理论家的相近范畴产生交汇与碰撞。

此间精妙者繁多,反误者亦然。从早期的崇

今派、浪漫派直至当代批评文坛,小至“理”“真”等内涵外延,大至其古典主义文艺观的流派划分,论争从未止息。近年,布瓦洛古典主义文艺观的相关研究的总体趋势是积极的,其成果的发表数量呈稳健上升状态,2010年以后发表的学术成果占比过半,相关文献引用数目逐年递增,所涉研究以文学艺术为主,兼有音乐、美术等其他艺术领域。

## 一、根植西方诗学传统的新法典

布瓦洛古典主义是西方文艺理论发展的重要阶段,该理论于传统诗学中汲取菁华,并凭依法国文学精神与社会政治形势发其新质,成为界定和划分文体的圭臬。

古典主义文艺观对西方诗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可向上溯源至亚里士多德。首先,在对理性、真、自然关系的处理上,《诗的艺术》与“模仿说”一脉相承,承认美与真由摹仿自然而统一,文学通过摹仿古人实现艺术真实,并经由逼真的技巧激起情感共鸣。其次,古典主义悲剧以亚里士多德“剧情统一”“篇幅恰当”的基本要求为基石并划定时间、空间限制,脱胎出“三一律”的典型范式。此外,“陶冶论”对文学愉悦性及教化功能的重视,也启发布瓦洛将实用与趣味相结合。

收稿日期:2020-05-19

作者简介:柏红果(1996—),女,江苏阜宁人,硕士生,研究方向:文艺美学及文学理论。

新法典对贺拉斯的理念多有继承。语言上,布瓦洛逆芮尼而对讽刺诗语言提出的“雅训中听,无瑕清丽”规范,借鉴了贺拉斯深广而节制的冷嘲传统;而对“讲分寸的艺术”<sup>[1]33</sup>中叙述的重视,则与贺拉斯排斥惨烈事实的表演性再现相契合。内容上,《诗的艺术》对创作者真、善价值尺度的坚守,及劝谕读者、寓教于乐潜在目标的推崇,也同《诗艺》不可分割。此外,布瓦洛对于悲剧发展脉络的梳理概述,几乎完全采用贺拉斯的结构模式,这种大规模的汲取与吸收难免存在咀嚼不精之处,以致部分谬误与疏漏处也被继承与保留<sup>[1]33-35</sup>。

人文主义与笛卡尔唯理主义既为布瓦洛古典主义提供最直接的理论养料,也成为其局限性的根源。一方面,文人主义提倡古希腊罗马文学,崇尚人的自由与价值,在为古典主义以旧题材纳新主张的意图提供合宜方式的同时,也因极端个人主义倾向警示布瓦洛对悲剧、史诗等主要体裁做出严格规范,此后古典主义者以资产阶级基本立场表现出的与分封贵族的对立及对王权的妥协也大体根植于此。另一方面,唯理主义重视表现时代精神,提倡控制情感,这为布瓦洛捍卫理性,追求“常情常理”的创作要求提供了理论依据。虽笛卡尔所述“科学理性”与布瓦洛“封建理性法度”<sup>[2]</sup>间存在差异,但二者都表现出借文学规范建立精神秩序的内在要求,以期在政治与思想领域平衡贵族势力,为资产阶级夺得更多自由与话语权力。因此,即便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对感性实践的忽视及对市民阶层文学创作的排拒,古典主义自笛卡尔处继承而来的理性仍旧客观推动了十七世纪法国的文化发展进程。此外,叱咤法国文坛的马莱伯、甘迪莲、龙穰、莫里哀、拉辛及拉封丹等作家的文艺创作,亦成为布瓦洛古典主义美学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养分。

法国独有的精神特质凝结为布瓦洛文艺观念的根源与脉络,而政治、社会形势则为“新法典”繁茂枝干。十七世纪的法国,君主专制臻至全盛,路易十四为扩大在欧洲的文化霸权设立法兰西学院,以推崇法语为“最完美的”语言文学的行动与资产阶级文人尊崇古典文化传统、规范文体的主张一拍即合,于是胡格诺战争落幕之后,为制衡贵族割据势力,确保国家统一与自身利益,中央王权与资产阶级于古典主义阵地达成短暂和解。

古典主义文艺观至高权威性的得成,离不开

王权宫廷的赞誉推崇,路易十四为布瓦洛预留法兰西学院院士空缺并明令其掌管文坛制衡贵族,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倾向。相应地,布瓦洛也曾多次在《诗的艺术》中展露对君主王权的敬重,排斥“过火”“离奇”“标新立异”的艺术表现,旨在以严格文体规范道德精神,建立起资产阶级与宫廷王权双赢的统治秩序,并直言对市民作家的排斥及对贤明君主的讴歌等,政治态度激昂鲜明。以布瓦洛为首的古典主义文人多于王室宫廷任职,他们的主张具得益于“和一个贤明的君主相得益彰地上下呼应”<sup>[3]33</sup>,得益于资产阶级与中央王权在政治文化利益上的相对和解,这种“合力”成为古典主义文艺观初成阶段的强力推手。

社会与历史的根源为《诗的艺术》塑形,而布瓦洛个人的讽刺天赋及艺术修养则为其孕育灵魂。讽刺诗在尼古拉·布瓦洛·戴普雷奥的创作中占据中心地位,细致的文辞与不留余地的批判展现出谨慎与大胆、沉稳与意气并存的气质,与其以旧情节释新主张的古典主义理念契合,“他的感觉力早已与理智合而为一了”<sup>[3]22</sup>。布瓦洛的文艺理论,以法国文学精神为经,以社会政治形势为纬,并以其个人特质为魂,最终炼化为“古典主义的菁华”<sup>[1]4</sup>。

## 二、古典主义视域下文艺创作的原则及新质

布瓦洛《诗的艺术》由亚历山大诗体写作而成,其中所论古典主义理论以灵感与理性为首要原则;各体裁界限分明,特征明确,不可混同,并对诗人及诗的品格提出了新的要求。

### 1. 灵感拱卫理性

古典主义文学的基本创作原则,即以捍卫理性为绝对中心,以灵感与自我批评意识为其拱卫,在自然合理的基本要求中追求语言的纯粹性及典雅性。

该原则对天才及灵感的重视体现出对柏拉图的批判继承。一方面,以灵感区分“诗匠”与“诗人”的理念,与柏拉图《理想国》中对“诵诗人”与“诗人”的划分存在共通之处,柏拉图以诗神力量的传递性区分二者,表明对“神灵凭附”天才的推崇及缺乏创造性的技巧的排拒,而布瓦洛则以驱逐“凑韵”技艺的要求,实际将用韵技巧排斥出天才的范畴。另一方面,布瓦洛要求以“自然”代替柏拉图的“神”成为灵感的赋予者,唯有凭依自然

人性而摆脱迷狂状态,才不至于“错认了自家格调,失掉了自知之明”<sup>[14]</sup>。这种理念坚持情理先于韵脚,义理甚于辞章,实际将灵感获得与义理体悟等同起来。

古典主义文学对理性的捍卫突破了贺拉斯的理性原则及模仿原则。在理性的获得途径上,布瓦洛强调其先天性及不可获得性,与贺拉斯并重天赋与训练的观念相悖,而与柏拉图的理式说相承继。在理性的来源上,布瓦洛则以封建统治阶级观念为尺度,强调中央集权下的社会安定“常情”和节制情欲,履行义务,为家国社会效力的古代英雄“常理”,与社会政治需要相适应,改变了贺拉斯以逻辑能力及日常生活情理为依托判断标准。而在摹古与理性获得的关系问题上,布瓦洛则进一步深化了对《诗艺》及《诗学》的模仿说的诠释,要求文章切勿刻意求新求奇,应如古希腊文学般详略得当、起伏有序、典雅而不滥俗,概因古人的智慧由自然中来,摹仿古希腊就是摹仿自然,而摹仿自然就是摹仿理性,唯有这样的文章“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sup>[15]</sup>。

此外,古典主义文艺观的理性推进了语言的纯粹化及典雅化。首先,布瓦洛以“常情常理”的主张对圣阿曼等“意大利式”作者发出挑战。在文章内容的把控上,古典主义理论与海明威的“冰山法则”不谋而合,要求既不过分铺陈细节,也不可求简练而词不达意,务求凝练而不可增删一字。其次,他要求详略得当的内容与起伏多变的形式相配以臻合宜,作家文风应能自然从容地由严肃转入诙谐,自庄重过渡到柔和,实际上以“典雅”的圭臬杜绝了“俳优体”弊病,拒绝对神及英雄的调侃,排斥一切粗鄙、市井和滑稽的组分,强调古典主义“崇高而不骄矜,隽雅而无虚饰”<sup>[19]</sup>的典型风格。此外,明畅正确、纯粹理智的原则体现出语言纯化的要求,就此,布瓦洛对马莱伯重哲理而轻想象的古典派语言予以至高评价,“你心里想得透彻,你的话自然明白,表达意思的词语自然会信手拈来”<sup>[1]12-13</sup>。

最后,对自我批评的重视也成为其理性原则的表现。他要求创作不攀比速度,不吝于增删,规避“各以所长,相轻其短”的故旧习性,请独具鉴赏力的批评者公允品题,臧否得失,以突破规律。“一个傻子总找到更傻的人来捧场”,而一个益友“一发现你的错误就绝不让你宁息”<sup>[1]16</sup>。

## 2. 体裁的再规范与新特质

《诗的艺术》对各文学体裁的再界定及其文体特征、创作规范及结构格调的重新划分显现出布瓦洛古典主义文艺观严谨与创新的双重特质,体现出对古希腊、中世纪文艺理论的发展及鲜明时代要求。

### (1) 严格的规范与节制的表达

严格的规范与合宜、节制的叙述是布瓦洛对主要文体创作的统摄性要求,是对古希腊创作理论的承继与发展。

形式的严格规范首先体现在悲剧体裁上。悲剧须以情节为中心兼及表现方式进行构建,在亚里士多德及约代尔关于剧情统一性及篇幅适当性讨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一天一地一故事的“三一律”创作规范,强调发端情节须简明扼要、迅速入题,高潮情节则必铺垫充足、瞬间爆发。

叙述的节制即情感的节制,是布瓦洛对语言形式做出的根本规范。它要求以叙述与表演、听与看结合的长篇叙述形式呈现情节,因为情感过于浓烈的场景在舞台上不宜再现,如惨烈的屠杀或放纵的情爱将使观众的欣赏失去分寸,因此“只应该供之于耳而不能陈之于目”,创作者须克服宣泄式的情感井喷,以节制的叙述适宜地进行再现真实,使情节“迫使我们流泪却为着我们遣怀”<sup>[1]30</sup>。

布瓦洛将节制叙述与规范形式的要求由悲剧广及其他文体创作。与古希腊以政治讽刺为主的旧喜剧不同,布瓦洛对阿里斯托芬等人“百无禁忌”的语言形式提出质疑,要求削减其讽刺性,“戏谑而不为虐”“不伤人而得人怜”<sup>[1]52</sup>,与斯巴达时期新喜剧要求存在继承关系。喜剧叙述力求典雅、凝练和紧凑的要求,既回避痛苦与哀叹而呈现合理的诙谐妙语,也摒弃滑稽剧粗鄙下流的用词,在格调上实现雅趣的并重。此外,牧歌须漂亮而无繁文,可人而谦逊,质朴而无矫饰,幽雅而不激昂,严格遵从陶克利特及维吉尔的经典范式,避免过分激昂及拙劣平庸两种极端;箴铭不可专于想象或双关炫技,以理性统摄隽语,务求短小精悍,发人深省;对商籁、循环歌、迭韵律诗及风趣诗的规范亦展现出节制的理性。

### (2) 不完美的英雄与“装饰”的神

在对“神”的态度上,布瓦洛认为史诗应“装饰、美化、提高、放大着一切事物”<sup>[1]41</sup>,其中“装饰”即指代古希腊神祇,它们被荷马等诗人创造

并用作文字装饰,缺乏装饰的史诗将冰冷平淡而乏味,与历史没有区别。换言之,史诗并不反对俄林波斯神统入诗,但同时,布瓦洛认为基督教的神不应与古希腊的神混同,塔索等在基督教题材内混杂古代神话的创作是须被排斥在优美史诗以外的,对以“卫教”为目的主题臃肿而“体裁消瘦”<sup>[1]47</sup>的创作予以批判。

而对英雄形象的塑造,则体现出对中世纪英雄史诗悲剧性格与邦国意识的承袭。“伟大的心灵也要有一些弱点”<sup>[1]37</sup>,要求切忌矫饰,摒除死气,自然分明,这些弱点“不是美质,要把它写成短处”<sup>[1]37</sup>。不完美的英雄更能彰显时代、国家及地域的突出特征,他们忠君爱国、团结勇敢,集一切封臣的典型品质与普遍缺陷于己身,并因弱点的“自恨不能消解”而立体。

布瓦洛对英雄及神的定位表现出维护王权的政治立场及王权高于教权的时代特征,对“神”及“英雄”的再定位,成为扼要主题、热情格调及节制表达外衡量创作优劣的标尺。

### (3) 自然人性与美的真理

通过对主要及次要体裁的再划分与再定位,布瓦洛将理性、真实与美统一于对自然人性的摹仿中,并凸显和强化文艺创作主动的教化功效。

不“真”就毋论“善”和“美”。他要求悲剧内容则兼顾艺术真实,“令人觉得可信”;喜剧创作深入钻研自然人性,“专以理性娱人,永远不稍涉荒诞”<sup>[1]55</sup>;即便是专司抒怀的牧歌也切忌“句句话岂有此理,句句话言不由衷”<sup>[1]20</sup>的无病呻吟,而以歌颂胜利与饮宴为题材的琴歌也当在凌厉壮阔、恢弘大气的同时尤重真情实感;至于讽刺诗,则必须雅训中听、无瑕清丽,“不是急于骂人,是急于显出真理”<sup>[1]26</sup>。只有自然的人性才是最真实的,“真”的对象才能引发普遍的情感共鸣,内蕴普适的理性。

在对“真”与“理性”的强调中,布瓦洛对柏拉图、贺拉斯等有关文艺创作教化功用的论述做出了新的阐释,他不再着眼于自由的诗与生俱来的教育性,弱化通过传达神的旨意而达成的教化效能,强调通过对形式及内容的规定,主动在文学作品中注入道德标准和行为要求,有意识地实现教化的目的。

### 3. 坚守诗人及诗的品格

古典主义以庄严节制的态度与诗人约法三章,展现出这一时期法国乃至西方文学新的格调。

其一:嫉妒即平庸,平庸即恶劣。写作艺术仅划分优秀与恶劣二等,平庸者善妒,合格的作家必杜绝阴谋鬼祟,不攀附权贵,自尊自爱;同时须具备自知之明,明辨自我的天才。

其二:须善于接受批评。真的诗人须采纳“善的”和“好的”意见,明辨诋毁与苛责;同时,善于择取恰当的品题者,他不必作诗顶好,但应理智而博学,鉴赏观念正确,能力上乘。为实现这一要求,作家应善于处世,不闭门塞客,且有十足风度。

其三:应坚守真、善、美的价值尺度。勿令创作成为敛财的技艺,务必展现高尚的品格与荣誉而摒除罪恶与盗淫,对爱情的描写须雅洁并内蕴理性,结合真知与风趣,教育读者并使之欢愉,坚持理性真实的价值尺度,怀抱社会责任感并履行道德义务。

如此一来,古典主义视域下,诗的品格将永不向金钱回落,而专于承继古典理念和传达自然真理,维护文明与秩序,在政治机器的护航下万世不竭。布瓦洛《诗的艺术》为该时期文艺创作彰其魂、述其体、定其格,古典主义文学理论自此兴盛。

## 三、布瓦洛古典主义文艺观的历史影响及当代价值

《诗的艺术》以诗的形式评述各类文体,推崇古希腊罗马典范,批评流行,为古典主义文学立法,于众多艺术及社会领域彰显其审美及意识形态的双重属性,历久弥新,始终内蕴美学价值。

西方古典主义曾兴起三次复兴潮流。其一为自十四世纪始的文艺复兴,其二为十七世纪由法国兴盛并广及欧洲大陆的新古典主义文艺思潮,其三为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美学,其中先行者重绘画,后起者重建建筑,而承启者尤重文学。他们与古希腊先贤同调,寓变化于齐整,奉艺术以圭臬,将蜿蜒的曲线认作美的典型,而美是物体形式的合谐,如布隆代尔所言“产生于度量和比例”。这种对“和谐”原则的坚持维系了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及启蒙主义的同一内质,直至黑格尔美学中呈现为“有机整体说”及“美在自由”说。

在当时,整个文坛以布瓦洛所创法典为理论中心,于文学创作、政治法度及哲学观念上浸润其美学主张。

具体创作上,它摹古、定法,注重现成情节的加工与革新,严格界定文学体裁的边界及特点,在此基础上强调共性、重视概括性描述,并尤其突出

文学的愉悦性与教化功能。如上文所言,布瓦洛口中的摹古有别于再现,理性第一的主张旨在塑成社会精神秩序,其叙述强调冷静与节制,其教化则重在与王权的同调及对割据的排拒。无论是绘画的对称关系与主次安排,还是建筑结构的比例与制式,都彰显出它的规律与精神。

政治倾向上,它坚守民族统一,反对封建割据而歌颂贤明君主,创造更好的秩序,并从秩序中获得自由与和谐成为政治与美学的共同诉求。文体的划分与国家的法度都受到规则的制约,并通过对规则的遵守获得合理性,但规则的制定始终不能避免个人或阶级的情感倾向,其实质依旧是借助赋予个体思想以普遍形式来规范自身领域的混沌状况,凝聚力量并寻求发展与质变。作为于宫廷任职的资产阶级文学家,布瓦洛的美学原则与路易十四的政治主张相合而不相融,妥协而不同化,摹古定法的最终目的是引入新质,制定规则的根本诉求即是消灭规则。古典主义美学深谙“内圣外王”之道,欲教资产阶级“修义之柄、礼之序,以治人情”,终至圣王之田。

哲学理念上,它则崇尚理性,自我克制,追求常理常情。理性、真、自然三位一体,自然即普遍公认且切实可感的“真”的对象,美与真借摹仿自然而统一,天才通过义理达到文章的完美。它令“理性”与“自然”相辅共生,概因一旦丧失理性,人和社会就要偏离常轨。

布瓦洛理论的美学价值曾一度为社会主潮所质疑,这一质疑自莱辛《汉堡剧评》攻击《诗的艺术》始,继有施莱格尔兄弟,后更因伪古典派对《诗的艺术》过分推崇而引发浪漫派的集中攻讦,此次论争声势浩大,以致后世常以“古典”与“浪漫”为相反两面,甚至以此泛指以形式与内容、“为人生”与“为艺术”、系统与自由、实践与想象各为中心文学立场的对立。然而自阿波罗与狄俄尼索斯诞生为血肉骨亲始,理性与感性、秩序与迷狂便不可分割,任一位作家都同具古典与浪漫因素,任一条巴那斯山脉都坐落日、月两座神殿。正如布瓦洛本人崇尚灵感却厌恶迷狂,歌颂天才却严守规范,当文学被界定为“高度集中地反映生活与抒发思想感情”的媒介之时,“古典”与“浪漫”的矛盾本身即成为它最本初的特质,正如古

典主义之于崇今派,现实主义之于浪漫派,“对立性”实为文学自有的惯性。因此在浪漫主义盛行时期,布瓦洛的贡献依旧被承认,文学革命结束以后,《诗的艺术》再次恢复其典范地位。

古典主义文艺观具共时与历时美学效应,因此在当代也具有新的价值。“CLASSICISME”以“CLASSIC”为主义项,具“优秀”“典范”的内蕴,溯源至拉丁古典主义,又有“阶级”“团体”的内涵,及至今日,则更多呈现为一种理智、稳定、系统的思维方式与基本态度。过去给予我们什么?我与先祖、与民族共有何物?什么才是贯穿过去、现在及未来的永恒与真实?这些存在应被如何传承?在当代文学因新媒介井喷壮大、过度自由冲击准入门槛、“娱乐至死”倾向甚嚣尘上的现状下,古典主义须得发其新质,重整威严,与“自由”约法三章。

其一,于创作者而言,需着力重塑写作规范,将远逊“俏皮话”的媚俗因素、快餐成分切除;杜绝新美学实践中质与量、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倒置,于雅俗流变中坚守文学性;唤醒灵感与天才,拒绝恶劣的平庸,重拾真善的尺度与矜贵的傲骨。

其二,于接受者而言,则需依布瓦洛所言,明辨优劣,严守现实丑与艺术美的界限,尤其警醒“暴力美学”“形式实验”“通俗文学”于创作目的、中心理念及目标群体上是否合其规制,“丑只有在它是美的凝结的工具的时候,在审美上才有存在的理由”<sup>[4]</sup>。

其三,文艺批评者首先应致力于鉴赏力的磨炼与提升,继承布瓦洛等古典主义者讽刺的天性,将鄙俗的驱逐出境,让低劣的无所遁形,字字切中要害,句句振聋发聩,参照旧时的“法典”重制当下的法规,肃清摆钟往复间过犹不及的“自由”“浪漫”携来的糜烂散漫,重建自由中的法度。

十七世纪的法国,布瓦洛以《诗的艺术》为古典主义文学立法,度之以规矩,丈之以秩序,甄别文体、臧否文坛,上承先哲、下启后世,历久弥新,内蕴深远。即便“当时援引布瓦洛的权威最热烈的无疑地不是布瓦洛会引为同调的人们”,时间也将还其本真样貌,正如理性终将还自然以真实。

## 参考文献:

- [1] 布瓦洛. 诗的艺术[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 [2] 范九生. 理性的呼唤——古典主义文学[M].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42.
- [3] 圣勃夫. 布瓦洛评传[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 [4] 鲍桑葵. 美学史[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74.

## The Aesthetic Study of the Classical Literary View of Boileau

BAI Honggu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7, China)

**Abstract:** The classical literary view of Boileau is based directly on humanism as well as Cartesian's rationalism and is inherited from Horace. It originates from poetics and benefit from his own satirical talent and artistic accomplishment. It becomes prosperous because of the part synonyms with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ests of court kings. The Art of Poetry is the classicist legislation. It states its principles, defines its genre and character, and defends its reason with inspiration, thus embodying the aesthetic implication of Boileau's view of literature and art. Its historical influence extends to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At present, it is presented by rational, stable and systematic way of thinking and basic attitude.

**Keywords:** Boileau; classicism; *The Art of Poetry*

(责任编辑:沈建新)

(上接第61页)

- [9] 周晓苏,陈沉. 从生命周期视角探析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J]. 管理科学,2016,29(1):108-122.
- [10] 王汀汀,李赫美. 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下盈余管理的动态研究[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8(1):42-52.
- [11] 黄莉媛. 管理者过度自信、企业生命周期与盈余管理[D]. 杭州:杭州电子科技大学,2018.
- [12] ROYCHOWDHURY S. 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R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6,42(3):335-370.
- [13] DEMERJIAN P, LEV B, MCVAY S. Quantifying Managerial Ability: A New Measure and Validity Tests[J]. Management Science, 2011,58(7):1229-1248.
- [14] DICKINSON V. Cash Flow Patterns as a Proxy for Firm Life Cycle[J]. The Accounting Review, 2011,86(6):1969-1994.

## Firm Life Cycle, Managerial Ability and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LI Miaoshuo, ZHANG Yingwei

(College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data of Shanghai and Shenzhen A-share manufacturing companies from 2013 to 201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agerial ability and the company's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was tested. It also furth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managerial ability on real earnings manipula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firm life cycle.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managerial ability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ompany's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activity. In addition, after considering firm life cycle, it is found that the degree of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managerial ability and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decreases as the firm life cycle advances.

**Keywords:** firm life cycle; managerial ability; real earnings management activity

(责任编辑:沈建新)